

奧克拉德尼科夫言論集

第一集

吉林省考古研究室

批判奥克拉德尼科夫和他的文化主权论

〈代 序〉

被苏修吹捧为西伯利亚、苏联远东和中亚地区考古学专家的阿列克谢·巴甫洛维奇·奥克拉德尼科夫，生于一九〇八年，毕业于伊尔库次克大学，从事考古工作近五十年。

奥克拉德尼科夫原是反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兼考古学家马尔的门徒，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坚持马尔的观点，夸大土著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特性，否认各族人民在思想、生活上的互相影响，特别是否认先进民族的文化对后进民族的进步影响。一九五〇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科学界对马尔学说进行了批判，在这种形势下，奥克拉德尼科夫收敛，隐去了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曾较为客观地报导过一些考古发掘情况。在谈到黑龙江流域远东滨海地区的考古发现时，承认那里的文化是受黄河流域文化的强烈影响；承认那里的古代居民是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的后裔；承认那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九六〇年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苏联改变颜色。这时的奥克拉德尼科夫为了适应苏联叛徒集团反华的政治目的和扩张野心，也改变了颜色。他重弹马尔的老调，发表了大篇关于西伯利亚

黑龙江流域和滨海地区的考古反华文章，肆意捏造和篡改历史，颠倒是非，挑拨民族关系，为老沙皇的侵略辩护，为新沙皇的扩张政策制造根据，因而受到主子的赏识，一时飞黄腾达，被擢拔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西伯利亚分院历史、语文、哲学研究所所长，被封为俄罗斯联邦和雅库特自治共和国的所谓功勋科学家。

正像前边讲的那样，奥克拉德尼科夫这条变色龙，为了适应各种政治气候不断在变化着；四十年代是一个样子，五十年代乔装打扮成另一个样子，六十年代撕下假面具露出狰狞面孔又是一个样子。因此，在他的文章中总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出尔反尔，矛盾百出。

他在五十年代写的文章中，认为：“中国的农人不仅同草原上的猎人—采集者及滨海地区的渔人相互接触，而且还同他们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他认为仰韶文化经过锦西沙锅屯传到了黑龙江地区。（见《远东各族文化的起源》）他说：“这方面的新证据，是1955年我在辽河流域的所谓石灰岗（或称锦岗）上的两层居址的发掘中找到的。在它的下层……有带着许多穿孔的凹底残片。完全同样的底部多孔的器物是古代中国炊器的特具。这种炊器主要是加工大米的，所用的方式是纯粹的中国式的蒸法。为此使用两个器，下面一个是高，置于火上，

在其中把水煮开，上面放着底部有孔的容器。……这种瓶形口的最早的例子，发现于华北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

（见《公元前第一千纪的滨海》）他肯定：“滨海的最古的居民起源于中国猿人型人们的后裔。”（见《从1953—1956年的研究看滨海的远古文化》）他在叙述滨海地区的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承认：“母系氏族被父系氏族所代替，交换加强了，和其他国家首先是和中国的联系巩固和加强了。这种联系促使原始公社制瓦解。”（见《西伯利亚古代居民及其文化》）

“在经济全面增长的基础上，正如邻近的朝鲜一样，这儿必定分化出了如此热衷于中国皇帝慷慨赐予的头衔和馈赠的当地贵族的上层，这种情况的直接证明是在绥芬河地区找到的公元五世纪的铜印。中国朝廷把这一印章发给当地酋长，作为确定他们受皇帝赏识的身份的标志。”（见《远东各族文化的起源》）他承认滨海地区最早出现的靺鞨族国家“受中国政权的统治并交纳贡品”它的酋长“不渝地表明他对皇帝的忠诚”，“伴随皇出征”，“得到赏赐和封爵”。（以上所引均见《西伯利亚的古代居民及其文化》）

他在这个时期的结论是：从远古起苏联远东地区就受着农业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国的影响；远东民族和中国有着血缘关系；中国是远东文化的故乡，出土的文物、生产方式都是从中国传入的；中国很早就在那里建立了政权，“建立了地方行政管理

机构 派遣了官吏”，直到明清。（见《滨海地区的遥远过去》）

尽管在这个时期在他的很多作品中还没能完全摆脱马尔的反动理论，但在确凿的客观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这些历史事实。这是因为：当时已经批倒了马尔论点，在苏联一对还没有多以市场，但是，没过多久，赫鲁晓夫之流上了台，于是，马尔的破烂货有了买主，奥克拉德尼科夫这个政治投机商也就成了叛徒集团的座上客。为了适应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华需要，他竟完全推翻了自己过去的说法，六十年代以后，他在马尔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基础上伪造历史，复诵老牌帝国主义的词句，伪造出一套支离破碎的侵略理论，并声嘶力竭地叫卖起来。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说：“我们远东土著居民的独特的，无双的文化特点，特别显而易见。远东下落文化的独特性和独立性，这些下落数千年来‘文化上自主性，表现在一切方面。’‘这里不是某个巨大文化中心的外围，而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策源地。’（见《最新的考古成就看苏联的远东地区》）

“阿穆尔河土著下族及其文化正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这些下族直接继承了他们祖先创造的自成一体的，并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以其独到之处达到高度水平的艺术文化。”（见《远东考古学的新成就》）这些就是奥克拉德尼科夫“文化主权论”的主要论点。他现在强调黑龙江、乌

苏里江流域的古代文化是独立的、先进的，它不但受黄河流域的影响，反而影响了黄河流域。他歪曲说：

“外贝加尔的矿芒成为东方草原的青铜文化，还在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起，就在诞生和发尸的基础上对中国青铜铸造业的发展产生至大的影响。至少，安阳发掘中发现的兽头形柄首和甚至显然是鹿头形柄首的刀子就表明了这种影响。”（见《海参崴附近砂磧半岛上的古代居址》）

“阿穆尔河典型的之字纹大概间接地也通过这里（指赤峰——作者）向南渗入到黄河流域，这可以从仰韶文化中出有过这种纹饰的个别标本得到证明。”（见《远东考古学的新成就》）

“大勇的进步因素曾由蒙古和其他地区的草原民族以及阿穆尔河流域各族传入古代中国农业业居民的文化中。”（见《阿穆尔河流域的古代遗迹说明了什么》）把一个举世共知的，自古以来就是落后的地区，硬说成是“独立而兴旺的艺术文化发源地”说成是“古代强大的文化中心”，为了达到卑鄙的目的，不惜出卖科学工作者的良心。正象奥克拉德尼科夫前一个时期在自己许多文章中讲的那样：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古代文化艺术和生产方式都是来自黄河流域，同样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经过很长时间的辗转地经过华北，辽西等等传到了那里。因此，那里发现的大勇中居文物和中居类型的文物只能证明它

晚于中尻，受中尻地区的强烈影响。奥克拉德尼科夫现在想人为地改变这种因果关系，只好采取极其卑劣的手法，那就是任意提早那里出土文物的年代，明明是两千年左右的文物，硬说成是四五千年的。四五千年前，中尻还没有出现这种东西，当然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就成为独立的先进的文化策源地了。他说辽东铁器的出现早于中尻，黄河流域的牛耕受北方居民的影响，铜是外贝加尔湖传入的等，来为其“文化主权论”作证明。我们说，碳素测定是科学的。但是有人由于某种卑鄙的政治企图，并没有真实地报导碳不测定的情况；假借科学名义来骗人，对人类是一种犯罪行为。同一类型的女真族氏族居址，出土了相同的文物和标本，却得出不同的结论。

根据奥氏的报导，砂磧半岛的古代居址中出现过两个倭型铁斧，这仅有的两件东西，就成为他大作文章的依据。据说，根据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对同出的木炭进行放射性碳素（ C^{14} ）分析，这两个铁斧应断为公元前10~11世纪的东西。但是，他承认这种铁斧就形式和大小而言和貔子窝以及牧羊城是一样的。貔子窝的铁口是伴随汉代铜钱同时出土的。砂磧半岛的倭型斧无疑地是经过貔子窝等地传入的，可是到那里以后却增加了九百年的岁月，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外贝加尔铜口的传播更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推断。外贝加尔

从很早的时代起就受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这是中外已有定论的。外贝加尔出土大舅的三足鼎，特别是鬲，就是证明。三足鼎、鬲之属是中国的固有文化。这是农业高度发展的结果。特别是鬲，是用来煮谷物和肉类的。在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奴隶社会，长时期延续使用着。外贝加尔出土的鬲，无论形制、制法、花纹都是中国的。这一点连奥克拉德尼科夫也不得不承认。他如石环、箭镞、青铜刀，更是如此。至于兽头柄的刀削一类的东西，在河北、辽东地区大舅发现。就刀面看，有的和商、周、秦汉的刀形完全相似，但有的刀身较短，这是中原刀物的变形，是少数民族民族在学习中原文化过程中为适合本身的生活需要而制造的。它是晚出的，有的和周朝的东西，有的和汉代的東西同出，它绝不能以晚期的东西形制为青铜制造业高度发达的殷代。这是不辩自明的道理。

至于说牛耕源于北方民族，更属无稽之谈。奥克拉德尼科夫的理由是：北方畜牧业发达，应该先知道畜力的使用，黄河流域是向他们学来的。牛耕是农业生产的需要，是农业高度发达的结果。并不取决于牲畜的多少。即使在今天，草原上大批的牛群也未尝用于农耕，这是同样的道理。更为奇怪的是：在渤海古代遗址中发现了很多板岩的仿中国铜口的制品，这应该说是中国形制的，而奥克拉德尼科夫却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他

说：“这就在于远东丁落（肃慎和挹娄）对中国是独立的，就在于他们那么明显表露出来的酷爱自由，……他们同样也并不力求同威脅他们失去自由和独立的殷周时代中国奴隶制国家有特别紧密的接触。因此滨海丁落不得不根据必要性而利用代用品。”（见《海参崴附近砂磧半島上的古代居址》）

仿中国青铜器的石制武器，正说明在中国强烈影响下，而自己丁落又极端缺乏金属的情况下造成的。奥克拉德尼科夫把上述情况解释为丁落情感造成的，而且本末倒置，把受影响的事实说成独立的象征，真是荒唐绝伦！

奥克拉德尼科夫的“文化主权论”（即文化的独立性）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他在骗人的时候，自己也有些心虚，总是那云闪烁其词。最后干脆避开政治、经济、文化上一些主要因素不谈，只在个别的艺术形式上找理论根据。在这方面他认为拿手的、津津有味的主张有两个：第一个是那里出土的文物上有“螺旋纹”和所谓的“阿穆尔河编织纹”；第二个是所谓滨海地区特有的岩画，特别是萨卡奇——阿梁的岩画。他认为这三种东西是黑龙江、烏苏里江流域古代居民所独有的，而且这些纹饰和岩画上的图案，一直被现在住在那里的那乃人（即赫哲人）所沿用。因此这种艺术是土生土长的、从古到今的、独特的。他强调说：

“‘阿穆尔河编织纹’正是滨海地区和阿穆尔河沿岸所特有的花纹”。

“‘阿穆尔河编织纹’是最精确的‘族属指示口’”。

“岩画是远东居民艺术文化的第二个同样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远东诸部落的审美观和对周围世界的艺术感触，在岩画中表现得更加强烈，更加集中。”（见《远东考古的新发现》）于是，“螺旋纹”、“阿穆尔河编织纹”、“岩画”就成为奥克拉德尼科夫的文化主权论的三张王牌。

其实所谓“螺旋纹”在仰韶纹饰中就存在，在商、周的口物装饰上也存在，特别是青铜酒口上尤为普遍，直到很久的后期仍然存在。岩画也不是滨海地区所独有的，即使和萨卡奇—阿梁同样的岩画也不是“乌苏里大森林中古老的那乃人村子”所“独有的”。这种岩画在吉林省西部地区就存在。

奥克拉德尼科夫是一个考古工作者，是个所谓历史学家，他应该懂得：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使从狭义来讲，它也应该包括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用一两个纹饰图样来代表整个民族文化，是讲不通的。何况这些又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是“土生土长的”。想用这么一两个纹饰图案来排除其他大量事实，是办不到的。我国各民族虽然有其某些传统上的差别，但就其生产方式，认识

形态总的方面，生长期的互相影响下，已经形成中华民族的统一文化。连奥克拉德尼科夫自己也曾承认：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生产方式和文化艺术，来源于黄河流域，相同于黄河流域。那就是说，那里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即使有某些习俗上的差别，也构成不了文化独立的依据。

所谓“文化主权论”，实际是“政治主权论”，他的企图是在历史上把黑龙江流域和滨海地区从中国划出来。既然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无关，那么沙皇俄国的霸占就不能称侵略了。这就是奥克拉德尼科夫等人罪恶目的所在。

不管怎么说，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文化和古代俄罗斯文化毫不相干的。那又怎么能构成俄国侵略的理由呢？于是，他只好在强盗的逻辑中寻找理论根据。他捏造说：“由于成吉思汗的灾祸和满清的擄掠、剥削”以及“传统的中国孤立政策”造成这个地区的停滞、落后和荒凉。这个荒无人烟的地区在等待着自己的“哥伦布”，等待着新土地的开发，因此，俄罗斯对这个地区的入侵是必要的，对这个地区是有利的。

“俄国人最后把这些地区并入俄罗斯国家，并在这里奠定了文明的基础。”（见《从最新考古成就看苏联的远东地区》）这和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炮设“大东亚共荣圈”替别人炮设“王道乐土”的理论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不是中国领土，为什么满清王朝能对这个地方进行“剝削”呢？如果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领土，中国为什么能在那里实行“传统的”孤立政策呢？这不是不打自招吗？那里的头领从隋、唐时期起就向中国皇帝朝贡，“伴随皇帝出征，得到赏赐和封爵”，“不渝地表明他对皇帝的忠诚”，这些该怎样解释呢？中国长期以来在那里“建立了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派遣了官吏”，这些都是奥氏讲过的屁话，今天又该怎样解释呢？讲“主权论”，无论文化和政权，只有中国对那里有主权。古今中外的文献，包括俄国的档案，大量的文化遗存都证明了这一点。历史事实不是几句谎言所能掩盖的。

明朝初年在奴尔干地区建立了政权，在黑龙江口特林地方修建了永宁寺并且立了碑。奥克拉德尼科夫现在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谈，却强调哥萨克匪徒们“首先发现了”特林地方的“古碑”，而这些“新土地发现者”就是这里的“哥伦布”。发现者就是最早的开发者，就有权占领；建庙建碑的不是主人，发现这些碑的倒成了主人。这种强盗理论，当年穆拉维约夫都不敢出口，今天，居然被这位历史学家讲出来了。

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时指出：“在讲过的话可以忘记、原则性可以丧失、世界观可以抛棄、决议和庄严的诺言可以扔到一边的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是不足为奇的。”奥

克伦德尼科夫的前后变化，是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作为他本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沙文主义者，也必然走上支持扩张主义的歧道。在苏联，主叛徒集团掌政的今天，一些御用文人出卖真理，出卖科学，也是不足为奇的。不久以前，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公然提出：“作家怎么写，历史就怎么保留下来，人们也就怎样记住”。这些话和戈培尔的“谎话说三遍就有人相信”，不是一模一样吗？为了达到他们这种反革命的目的，他们在这次会上公开提出篡改马列主义，主张“要善于引用不带引号的列宁的话”，主张“用头脑杜撰”，主张用这种办法在西伯利亚“填补空白”。如果说，过去他们还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今天则已经是一丝不挂了。这正是叛徒集团逼使苏联文人走向可耻的堕落。

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唐朝在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建立了黑水府。当时的渤海地区归忽汗州管辖。忽汗郡王大氏建立渤海政权，仍然臣属于唐朝，自始至终，朝贡不绝。以后的辽也好，金也好，同样是中国政权。今天的苏修最爱谈什么铁的辽国，黄金的金帝国。说这些民族建立的政权，不是中国政权，而是什么独立的象征，以便为他们的侵略理论服务。其实辽宋之争也好，金宋之争也好，那是中国之内汉族、契丹族、女真族的统治者争夺中央领

导权的问题；政权虽是分裂的，但民族是统一的。当时汉族地主政权在他们统治的地区，既统治汉人，也统治其他兄弟民族；契丹、女真封建贵族政权在他们管辖的地方，既统治本民族人，也同样统治着汉人。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的事迹共同载入中国的史册，这是中外公认的事实。奥克拉德尼科夫等人想以这些为借口，重演帝国主义南北对立论的老调，未免太愚蠢了，那些过时的破烂货是找不到市场的。

（王 健 群）

目 录

批判奥克拉德尼科夫和他的文化主权论	1
黑龙江上游的古代居址	1
远东各族文化的起源	7
在挹娄部落的国度中	33
黑龙江沿岸考古和历史方面的新报导	55
西伯利亚的古代居民及其文化	60
公元前第一千纪的滨海部落和黑龙江部落	69
公元第一千纪中的西伯利亚和远东	77

黑龙江上游的古代居址

一九三五年夏，根据波戈拉兹的倡议，苏联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组织了黑龙江流域的考古考察队，其任务是发现和探究从伯力到黑龙江入海口之间这一广大地区的各种考古遗存。（注1）

在一九三五年考察队发现或部分发掘的古代遗存中，大杜拉尔谷的居址是颇为有趣的。这个地方位于黑龙江左岸，在下达姆波夫村下游约五公里处，首先提到这个地方的是福克。

（注2）

宽阔的复盖着森林的大杜拉尔谷，延伸到河流基岸的腹地在那里，在谷地之上，耸立着给人深刻印象的花岗岩石柱。据当地居民说，那里是荒无人烟的大森林，并有老虎。福克转述说：那月人对他讲过，似乎是在古代，这里来了某一位带狗的大酋领，他是因为追熊而来到这里的，熊也好，带狗的猎人也好，都变成了石柱。福克写到：“远远看来，‘人’确实同穿着古典服装的雕像出奇的相似，而‘熊’也非常象这种动物的雕像，他好像通过石柱凝视着自己的追捕着，很多人企图爬上山顶，但谁也未能做到。”

在铺盖着巨大砾石的黑龙江岸旁有南台地，它和高耸的基

~ 2 ~

岸或更古老的台地相接。在这一层台地上，在谷地的左面，分布着一系列古代的住穴。这些住穴长满了灌木以及一人高的嫩棘科植物和蕨类植物，它们密密麻麻地把古代遗址的痕迹掩盖起来。遗址中的坑穴彼此配布紧密，似乎构成一个整体。坑穴的轮廓基本上是矩形的，内部呈稍隆的平面状，围有土墙，墙的一面（向河的一面）有开口。这显然是住屋的出口。为查明大杜拉尔谷遗址的性质，并尽可能了解它的年代，我们对一个坑穴进行了发掘，面积为 8×9 米，其旁有另一大小相等和形式相同的地穴，再远处是分布成歪歪一个村子的其余住穴。

在发掘的坑穴底部，在薄薄的草土层中，发现了破碎的部分经过烧烤的麋鹿骨，陶制器、暗绿色的玻璃瓶碎片。

在草土层的下面发现了石块，这是用圆石和石板砌成的“门”字形的手实的堆砌物。在石头的下面，可以察觉到有一层烟熏。这无疑是石烟道以及睡眠建筑，即取暖火坑或现代满洲——中国式炕的遗迹。炕配置在门口和对面，紧靠后墙及住屋两侧的墙（图1）。在门旁左方保存有灶的遗迹，这是一块大圆石和与其处在一起的石堆，在炕上发现一些磨光的大石头和一块扁平不大带有穿孔的石头（形如手磨）。在东北面墙下炕石之间有一个上缘已残的瓷碗。碗的内部有武士、梅花鹿，大象的图形和汉字【译注1】。在近处，也是在炕石之间，有